

边缘青年情绪心理危机的测量与疏导*

——基于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袁靖华

摘要:近年来,多起恶性事件的发生预警了边缘青年受忽视的情绪心理健康问题。作为主要的边缘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青春期这一特定的人生阶段,其心理状态、社会交往及人际交往中的情绪、情感体验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研究发现,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情绪心理健康最具重要性,但实际可依赖的倾诉渠道比较有限。此外,本研究还测量了交往中潜在的情绪心理危机程度,深入挖掘了造成人际交往的内隐性情绪心理问题的主要诱因,建立了有关外部行为的预测指标,探索疏导这一青年群体在人际交往中所存在的情绪问题,以帮助他们提高人际关系的品质,有效预防情绪心理危机。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情绪心理危机 公正 人际传播 社会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发生极端事件,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期消极和负面情绪的累积而造成的。这些极端事件也提醒人们“在贫富差距严峻的当下,直面底层群众的精神贫困、情感危机已迫在眉睫”(石述思,2014:2)。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属于“边缘人”。他们正处于躁动焦虑的青春期;同时他们大多远离父母和家人,孤身游离在人地生疏、价值观冲突剧烈、贫富对比悬殊的城市环境中。这种底层和陌生的人际关系原子化生存更容易导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现种种心理焦虑,从而诱发出进一步的情绪失调以及心理失范。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状态、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上的情绪、情感体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当中轻者会有人出现迷茫、苦闷、烦躁、冲动等种种负面情绪和行为;重者则会有人出现情绪心理危机,并进而产生各种心理疾病,甚至有人会产生犯罪或自杀等心理倾向。一般认为,在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和环境中,他们可能会产生如下心理健康问题。

(一)青春期的认同危机

人们往往把青春期形容为“第二次诞生”和“心理断乳”,这一阶段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危机阶段。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出版了《青春期》一书,提出了之后广为流传的“青春期危机”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青春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

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曾指出,每个人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皆面临各种危机,需要解决各种发展问题。就青年人来说,20岁左右的青春期的核心问题是获得自我同一性,避免同一性的危机与混乱;20多岁时则处于寻找家人之外的情感归属对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1968年,埃里克森出版了著名的《身份认同:青年与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一书。在这本书中,埃里克森进一步提出,20岁上下的青年人当中普遍存在各种“情绪困扰”,这是他们自我认同危机最为典型、最为集中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路径与可行性——以浙江为例”(10YJC860058)的阶段性成果。

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环境往往会诱发各种心理问题,从而导致青年的内在自我认同混乱,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自己的职责、自己所要承担的角色等。在很大程度上,青少年中盛行的骚乱和侵犯行为就是源于这种自我认同的混乱(Erikson,1968:232-260)。

同样,就处于城市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所处的特定年龄段也是其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面临着就业、恋爱、婚姻等种种重大问题;其工作、人生定位、情感生活、价值观念、性格塑造都还未稳定,心理不成熟,知识技能不足;且又背井离乡、离开了父母和家人的监管,外部的“政府、社区、乡村乃至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引导缺失”(韩长赋,2012:7)。从乡村到城市迁移所造成的强烈反差、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所有这些均给他们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心理震动。因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人生价值的定位上开始出现迷茫,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人交往的心态、自我认同等。

(二)城市边缘人的情绪体验与潜在心理疾患

心理学认为,苦闷、孤单、压抑、自卑、焦虑、失落感和挫折感等皆属于消极情绪。如果这些消极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则极易诱发人们的种种心理健康问题。苦闷、孤单易引起忧郁;压抑往往又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失落感、挫折感、自卑感所带来的,严重者极易造成一定的人格扭曲。

通过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年调查,美国精神病学家希利(Healy)指出,当来自社会关系的安全感、承认的需要、自我满足感、对新的经验的需要、独立自由的需要、占有财产的需要等所有这些受到妨碍时,年轻人极易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青少年当中存在长期的深刻的情绪不满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来获得代偿性满足(转引自孟绍兰,2005:288)。

精神分析等临床研究亦证实,人在挫折状态下的烦恼、愤怒、不满、怨恨、敌视等消极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宣泄,那么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产生极度紧张、焦虑和压抑感,从而进一步产生情绪冲动、爆发攻击性犯罪行为。这种攻击行为可能直接指向阻碍目标实现的人或事物;也可能转向攻击社会中的其他无辜对象(孟绍兰,2005:292)。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生活的“边缘人”,工作稳定性低、工资收入低、权益保障低、职业声望低、身份地位低。“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种种不平等……清晰地反映在农民工心理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王国平,2012:193-194)。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极易产生“心理剥夺感”、“不公平感”以及“自卑感”(李怀玉,2010:87-91),并进而引发种种负面的情绪心理。

因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情绪同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显著相关。

二、基本研究视角:人际传播与情绪心理健康

人们一般把人际传播看成塑造人格的基本材料,它主要满足了人们对于归属感和个体尊重的心理需求。有研究就此问题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人际关系高度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尤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金盛华、徐文艳、金永宏,1999:47-52)。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如果青少年移民在其移居地的互动交往的程度越深,那么他们的社会适应性就会越强(转引自毛晓光,2001:13-18)。一般认为,人际关系的质量或满意度会深刻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及亲密关系,有益于提升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情感愉悦程度(Hafen et al.,1988:79-115)。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亲密的人际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缓解消极的情绪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情绪构成了人际交往的重要维度。麦克罗斯基(McCroskey et al.,1985:165-173)等学者将行为、态度、情绪情感作为人际沟通研究中最主要的测量维度。

一般认为,人们在态度和情绪情感等层面的人际沟通心理往往与他们对于沟通行为的满意度

紧密相关(Rubin et al., 1988:602-628)。许多研究也有类似结果,即人们在日常环境和生活中所受到的心理困扰越严重,那么他们就越难以同他人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并进而实现社会融入(Gracia & Herrero, 2004:1-15);同时,个体所受到的沮丧和忧郁程度越高,那么他们寻求社会支持的行为就越低效(Rook et al., 1994:548-559)。

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正处于青春勃发、情绪波动大、情感需求饥渴的特定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往往躁郁不安、喜怒不定,渴望获得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融入感。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们与当地人的日常交往当中。同时,他们对于尊重和融入的心理需求也需要通过人际交往与信息沟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来进行响应。

因而,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3: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的人际交往态度、交往行动与其情绪心理显著相关。

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时,我们发现,在有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已有研究中,目前还较少有研究从微观层面上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情绪心理状态。通过个案访谈,李强(1995:63-67)曾研究过农民工在心理上所受到的受歧视感与不满情绪。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当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自卑心理和悲观情绪、失衡心理和焦虑情绪、孤独心理和受挫情绪、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被剥夺心理和抵触情绪等(康来云, 2004:85-88)。他们在情感表达和宣泄方面会受到生存型压抑和权力性排斥,从而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其“内卷化”、“原子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周永康、冯建蓉, 2011:95-101)。研究发现,在农民工与市民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情感因素普遍缺失(王波, 2007:88-91;洪婧茹, 2014:125-132)。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采用医学诊断专用的心理障碍测评量表(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等对豫、皖、粤、浙等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诊断和测量。研究结果普遍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程度低于全国常模,情况堪忧。

但上述提到的研究都没有结合人际传播的关系融入视角来调查具体成因。梳理已有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专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问题的成果一直比较匮乏。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情绪、情感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从微观层面深入考察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与本地人交往时的情绪心理,可以及时捕捉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所存在的隐含而紧迫的人际沟通需求,准确把握并预判他们的情绪心理发展状态,从而可进一步为有关社会心理融入与人际关系融入的研究提供情绪心理方面的参照。

在本研究中,我们拟通过实证研究来解决三个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状况究竟如何?第二个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如何排解他们的消极情绪?第三个问题是,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

通过研究,我们力图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人际交往中所存在的情绪心理危机的程度、他们在情绪宣泄时所依赖的主要途径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掘影响他们情绪心理状态的主要诱因,建立起影响其外部行为的预测指标,从而进一步探索可以有效缓解其情绪心理危机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新生代农民工当地交往中的情绪心理

(一) 研究设计

1. 人际交往中情绪心理的测量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医学诊断中专门测量的心理障碍、焦虑症或抑郁症,基本上不触及个体的沟通恐惧与心理疾病。

在研究的相关变量设计上,我们借鉴了个体心理健康测量研究中采用最多的四方面维度,它们分别是孤独感、压抑感(或抑郁)、自尊感及自杀倾向(Hafen et al., 1988:79-115)。同时,结合对于这一群体当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将研究重点主要放在这样一些问题

上,即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会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这样一些感受,包括苦闷感、孤单感、压抑感以及受歧视感(反映自尊需求的敏感性)等。

2. 抽样调查的方法及步骤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本研究所采用的抽样调查方法及步骤。

在具体的抽样调查中,我们首先以《2011年浙江省暂住人口统计手册》(2012年1月编印)统计的全省暂住人口为整体样本框,选定浙江省最主要的7个地级市(包括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台州、绍兴)作为抽样地,以这7个城市当时的暂住人口在全省暂住人口中的各自比值确定具体的抽样调查配额。在此基础上,我们于2012年7-9月在各地级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分别随机抽取2-3个县/区;同时,在选定的抽样区域内,结合行业分布和就业性质,我们又分别随机抽取2-3个工厂企事业单位、2-3个街道社区、2-3个商贸聚集区,进行多次分层后的等距随机抽样。在此基础上,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210份。在接受调查的1210名新生代农民工中,其年龄基本上处于16-32岁之间。问卷采取面访与自填相结合的方式,当即发放、当即回收。回收问卷1114份,回收率92.07%。经过进一步检验,最后有效问卷为1003份,其中男性样本567个,女性样本436个,问卷总体有效率为90.04%。在问卷的具体统计处理上,我们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分析检验样本中所包含的行业分布、所有制形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等基本人口统计数据。结果表明,这些特征与全国总工会、浙江省政府、省统计局等权威部门发布的人口调查数据总体较为接近。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问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的情绪心理危机

我们首先试图回答问题一所提出的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状况。

对此,问卷调查询问新生代农民工“您在与本地人的日常交往中是否感到很孤单、感到很压抑、感到很苦闷、感到受歧视?”我们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来进行评分(其中“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有一点”、“3”表示“有一些”、“4”表示“较严重”、“5”表示“非常严重”)。

通过均值比较结果,我们发现,在与当地人的日常交往中,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以上所提到的四种消极情绪(分别是苦闷感、孤单感、压抑感、受歧视感)。其中表现最为严重的是苦闷感;其次是孤单感、压抑感;受歧视感相对较轻。具体研究结果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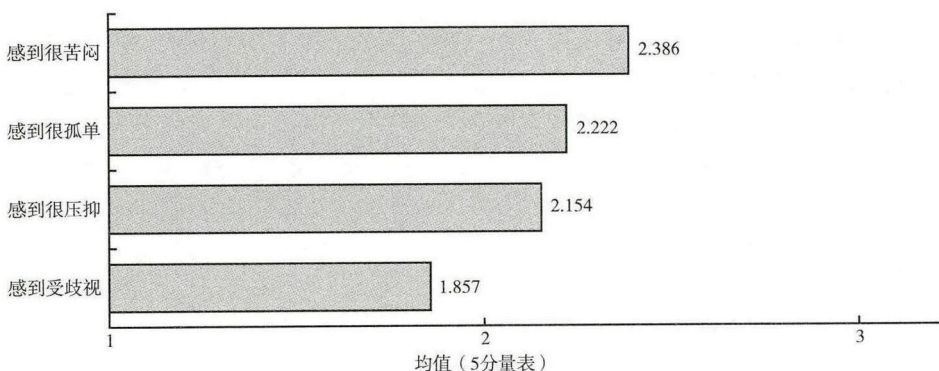


图1 新生代农民工中四类消极情绪的表现程度比较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上述四项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同时自动抽取特征值 >1 的因子,最后得到的是单一因子。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四种情绪基本上属于同一因子。我们把这一因子命名为“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

我们采用计算变量的工具,重新赋值到变量区间 $[-1,1]$ 。在此条件下,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1。如果因子得分为正值,那么则表明情绪心理越不消极;绝对值越大,积极倾向越明显。如果因子得分为负值,那么则表明情绪心理更倾向消极;绝对值越大,消极

倾向越明显。均值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体验的均值为-0.42。这同他们与当地人的交往意愿(均值为0.24)、交往行为(均值为0.09)、本地异质交往关系(均值为-0.16)等因子的均值统计相比,情绪心理体验的负值数最大。这也说明,在与本地人的日常交往中,新生代农民工消极、负面的情绪心理体验较为突出,他们的心理挫败感、人际疏离感较为强烈,情感心理上的本地归属感明显空缺。

(三) 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依赖途径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二所提出的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排他们的解消极情绪的。

对此,我们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宣泄其消极情绪的主要依赖途径。同我们对于前面一个问题的研究类似,我们对每一条指标测量还是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表示“肯定不会”、“2”表示“不大会”、“3”表示“有点可能会”、“4”表示“有较大可能会”、“5”表示“肯定会”)。通过均值比较结果,我们发现,当需要宣泄自己的消极和负面情绪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条途径是向自己在同一城市的老乡、工友进行倾诉;第二条选择途径是自己独自忍耐;第三选择途径是向自己在家乡的家人、亲友倾诉;第四条选择途径是在网络等自媒体平台公上开表达。研究结果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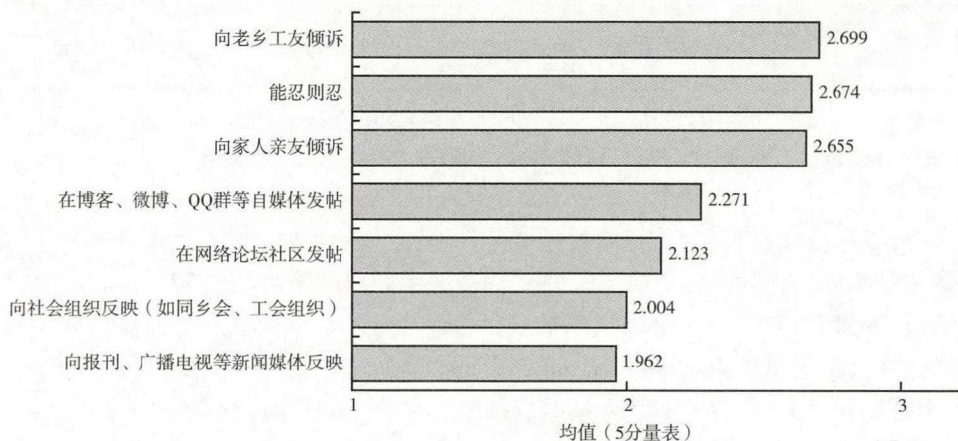


图2 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途径

因而,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宣泄消极情绪的可得途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排在首位的依然是首属群体(包括家人、亲友、老乡、工友);其次是在自媒体平台上的主体表达;而社会组织机构和大众传媒则排在最后。

我们对上述几种宣泄途径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获得2个因子。其中因子1“向家人/亲友、老乡/工友倾诉”2个指标构成亲密人际倾诉途径($\alpha = 0.70$);因子2“向社会组织(如同乡会、工会组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反映,在网络论坛社区、在博客微博QQ群等自媒体发帖”4个指标构成对外公开表达的途径($\alpha = 0.85$)。通过比较,我们进一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向具有亲密关系的人际交往对象倾诉消极情绪(因子1的均值为2.68);但是,他们较少通过各类媒介渠道向外界作出公开表达(因子2的均值为2.09)。

因而,研究结果也充分说明了,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情绪情感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具有第一重要性。这进而也支持了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研究假设2,即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缓消极的情绪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四) 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消极情绪的归因分析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三所提出的问题,即哪些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

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日常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我们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获得了如下结果(参见表1)。

表1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的显著因素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1.031	.190		5.434	.000	
工作权益受侵害度	.290	.024	.384	11.831	.000	.915
同质关系网聊频率	.109	.030	.123	3.620	.000	.834
社会距离感(交往意愿递减)	.120	.040	.108	3.039	.002	.768
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度	.100	.028	.116	3.580	.000	.924
在浙调换工作频率	.036	.013	.089	2.793	.005	.937
异质关系网聊频率	.086	.032	.096	2.736	.006	.784
居住条件边缘程度	.037	.018	.065	2.084	.038	.974
与本地人实际交往行动量(递减)	.074	.037	.071	2.009	.045	.771

注:因变量为“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回归平方和为113.491,残差为348.840,F值为31.883,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R方0.245,调整R方0.238,模型具有23.80%的解释力。模型的统计显著性Sig.=0.000。

在表1中,工作权益侵害程度为“超时超量工作、缺乏社会保障、拖欠工资、劳动安全健康威胁”共4个具体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alpha=0.85$);同质关系网聊频率为“在网上与家人/亲戚、老乡/同学、同事/老板/等聊天频率”共3个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alpha=0.75$);社会距离感(交往意愿)为修正后的鲍氏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中“愿意和当地人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如未婚愿和当地人结婚或结亲”共5个测量指标获得的单因子($\alpha=0.89$)。所有这些均符合因子分析及效度检验的要求。

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交往中的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工作权益、网聊频率、交往意愿、组织活动频率、工作调换频率、居住条件、与本地交往行动量。工作权益受侵害越严重、网聊越频繁、与当地人交往意愿越低(社会距离感越大)、越经常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工作调换频率越高、居住条件越差、与当地人交往行动量越少,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消极情绪就越突出。工作权益、工作调换频率、居住条件这三个指标可视为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地位的象征,它们与其人际交往中的消极情绪显著相关。这同时也验证了研究假设1。交往意愿、与本地交往的行动量则分别从人际交往的态度、行为两个层面与其消极情绪心理显著相关,这同时也验证了研究假设3。

四、缓解农民工消极情绪的外部疏导途径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提出缓解农民工消极情绪的几条外部疏导途径。

(一) 获得公平公正的工作权益,最大程度地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从分析结果来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情绪心理危机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各种工作权益受到侵害的程度。农民工在工作中越是体验到不公平、不公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各种正当权益的受侵害者,进而在本地交往中也就越容易累积各类消极情绪。由于“超时超量工作、缺乏社会保障、拖欠工资、劳动安全健康威胁”等各种工作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农民工的情绪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严重危

害,从而最种引发各种心理危机。

“工作权益的平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Schaff,2001:201),“社会不公的体验总是与公认的合法的承认没有得到认可有关”(霍耐特,2009:79-87)。因为“相对剥夺感”而产生普遍的不公平焦虑是对于社会危机问题的重要警示(王俊秀,2005:1-9)。在现实生活中,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发生的跳楼、自杀、公交纵火等恶性社会事件就是同缺失公正保障而长期累积的消极情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有关部门应尽快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权益,以有效缓解其心理危机。

(二)提升人际关系的融入品质,提高心理归属感,有效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交往中的消极情绪与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尴尬身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只有真正实现了社会关系的融入,使新生代农民工从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转变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市民,才能从根本上消弭他们与城市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从而真正缓解情绪上的压抑感和孤独感。

对于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的交往意愿越低,所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大,那么他们之间的实际交往行为就越少,从而就会显著加剧他们的消极情绪。同时,工作不稳定、居住条件边缘化、远离市中心,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行为。而新生代农民工突破同质性的人际交往圈,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意愿越积极、交往行为越多,那么他们的消极情绪就会越少、心理归属就会感就会越强。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人际关系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情绪心理健康水平。

但问题在于,当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疏远,他们在本地人际关系融入的低品质、疏离乃至隔膜已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本地生活中的情绪心理,从而造成他们对本地缺少情感心理上的归属感,并直接加剧他们“边缘人”的心理孤独感和压抑感。因而,有关部门应该破除因居住隔离、社会排斥、身份歧视等造成的种种交往障碍,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无障碍沟通的社会关系支持系统,以进一步增进人际关系的融入,疏导消极情绪。

(三)善加利用网络和社会组织活动,缓解情绪心理危机

网聊、参与社会组织活动都是属于消遣性的交往行为,它们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填补情感空缺、宣泄消极情绪的重要手段,是他们排遣孤单寂寞、缓和交际匮乏、纾解苦闷压抑的代偿性满足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当中潜在的情绪心理危机。

因而,这两种活动有助于我们通过外部行为表现来观察这一群体的内隐性情绪心理。一般来说,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情绪心理体验不佳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网络虚拟人际交往和社会组织活动,从而获得心理归属感的代偿性满足。因此,社会管理机构包括大众传媒应该通过网络平台及时了解农民工群体的情绪心理动向,积极善加疏导;同时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的所在社区,有效组织他们的交际活动,从而增进人际交往及归属感,帮助他们缓解各类消极情绪。

“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泰勒,2005:13-20)。社会心理、情感意识层面的融入(个体自我意识到、知觉到的与社会联系的深度)(Gracia et al.,2004:1-15)对于增进个体幸福感(Cowen et al.,2000:79-99)、调适个体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Zimmerman et al.,2000:43-59)。

消解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交往中的消极情绪,关键是消除他们作为边缘人的心理孤独感,增进他们对于本地的情感归属感。其中最根本的实现途径在于给予他们公平公正的工作权益、社会权益,从而破除交往障碍,提升本地人际关系品质,并善加利用网络平台和社会组织活动的疏导功能,有效推动这一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人际关系融入程度。

参考文献:

韩长赋,2012,《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3月

16日。

- 洪婧茹,2014,《建筑业流动劳工的社会空间、人际传播与关系重构》,《新闻大学》第1期。
- 霍耐特,阿克塞尔,2009,《承认与正义——多元正义理论纲要》,胡大平、陈良斌译,《学海》第3期。
- 金盛华、徐文艳、金永宏,1999,《当今中国人人际关系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社会心理医学研究》,《心理学探新》第3期。
- 康来云,2004,《农民工心理与情绪问题调查及其调适对策》,《求实》第7期。
- 李怀玉,2010,《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形态调查分析——基于河南的调查》,《城市发展研究》第1期。
- 李强,1995,《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毛晓光,2001,《20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
- 孟绍兰,2005,《情绪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石述思,2014,《一个纵火案嫌疑人的残酷青春》,《工人日报》7月13日。
- 泰勒,查尔斯,2005,《现代认同:在自我中找寻人的本性》,陶庆译,《求是学刊》第5期。
- 王国平,2012,《“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社会心理研究”论坛在杭州召开》,《城市学研究》第4辑。
- 王俊秀,2005,《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分析报告》,《中国工商》第12期。
- 王波,2007,《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传播》,《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周永康、冯建蓉,2011,《农民工生活困境的情感社会学分析》,《城市问题》第11期。
- Cowen, E. L. 2000,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Routes to Psychological Wellness.” In J. Rappaport & E. Seidman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 Erikson, Erik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Gracia, Enrique & Juan Herrero 2004, “Determina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4(1).
- Hafen, Brent Q. et al. 1988, *Behavioral Guidelines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Englewood: Morton Publishing Company.
- Hall, G. Stanley 1904,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New York: Appleton.
- McCroskey, James C. et al. 1985,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PRCA - 24 as a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cross Communication Context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3(3).
- Rook, K. S., Paula R. Pietromonaco & Megan A. Lewis 1994, “When Are Dysphonic Individuals Distressing to Others and Vice Versa? Effects of Friendship, Similarity, and Interaction Ta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3).
- Rubin, Rebecca B., Elizabeth M. Perse & Carole A. Barbato 1988,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tiv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4).
- Schaff, Kory (ed.) 2001, *Philosophy and the Problems of Work: A Read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Zimmerman, M. A. 2000, “Empower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of Analysis.” In J. Rappaport & E. Seidman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兵